顾城海外生活的诚实记录

——《半梦》编后记

■荣挺进

大约2010年秋,《顾城海外遗集》六卷九册已初步辑录编成,“散文卷”《半梦》为末卷,顾城姐姐顾乡女士校读补注,在结尾处加写长注,回顾“十四天”之后与李英的接触。至2011年秋天,各卷陆续送审发排。本人持本卷和《小说卷》登门请文昕女士校看,细审与她相关的部分;病中的文昕很感慨,从不想谈顾城,到一发不可收的旧事重谈,到接受纪录片采访,我还和她做了个关于“最后的顾城”的对话,增补再版了她的《顾城绝命之谜》。由此,本人对顾城的探究,从文本延伸到他的周边,甚至拟探询如何联系李英女士及顾彬先生。于是,这套丛书在一个呼之欲出的关口,迁延下来,一搁一年,随即又是一年。经历了顾城和谢烨离世二十周年的2013年,2014年晚夏得知李英女士去世的消息,2016年底文昕也离开这个世界。三四年间,“小说卷”“诗歌卷”“哲学卷”先后出版,每卷编后记都写得很审慎;“演讲卷”“访谈卷”审校工作多有反复,个人工作也几度变动,全六卷同时出版的想法已放弃,但让它们完整出版依然是努力所在。

这一篇编后记,很早动笔,从北京写到上海、到杭州、到重庆,再写回北京,从书桌前写到列车上、饭桌边,甚至地铁里,时日甚长,而心意未惬,但这一过程,已多了不少对顾城、对顾城亲朋,对生命本体及现实存在的沧桑感。

本卷依据内容分为“忆往”“纪事”“随感”“散谈”“书简及日记”五类,按作者所写内容的年代次序编排,从童年记事起,到遗书止。通读下来,称其为一部顾城自传不差,参照其他五卷——“诗歌卷(上、下)(已出)、“讲演答问卷”“对话访谈卷(上、下)”“小说卷”(已出)、“哲学卷”(已出),这一“传记”读来很别致。如果说,顾城的诗是他生命历程一个一个眼神一亮的瞬间感受和印记,是许多天启时刻在纸面上烙印的闪光点,小说是他试图把其中一些有意味的原点分解、化开、再精心构造出的一段一段心思和颖悟,讲演和访谈(含哲学)是他走到人群里,与人交流的心得体会;这一大卷散文,就是他的生活本身,是他生命轨迹的诚实记录,也是串联其他著作的内在血脉。

1

生活里的顾城,并非别一个顾城,而是在苦干、猛干,其实很能干。

《养鸡岁月》就是这样一个纪事。据1993年1月1日顾城夫妇在法国与友人谈话录音,谢烨表示过:“我现在写那个养鸡的故事,因为那故事特长,我得一段一段写。”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1993年)10月4日星期一”记顾城和谢烨谈《养鸡岁月》的写作,写有一段话:

……后来说过这篇东西,谢烨好像不喜欢,说他把自己“写得也太积极了”,……谢烨说《养鸡岁月》“你这样写就不像你了”(意思不是说不像生活中切实的你了,而是不像那个他们共同塑造的艺术形象“你”了)。还听谢烨对顾城说:“养鸡这事儿不是说好了归我写吗?”顾城则笑,说:“归你,归你。”

照此“分工说明”,养鸡这个故事,应由谢烨来写却让顾城占了先,虽然长而完整,显然属于计划外成果。而养鸡这件事情,很能展现顾城“实干筑梦”的面貌。

《养鸡岁月》全篇68节,回忆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新西兰激流岛的生活。顾城发现过期报纸上那座待售的房子,约闵福德教授一家赴岛看房,贷款买房,入住之后不断修补房子,他们为在那房子里生活下去付出各样努力,如种菜(顾城自嘲为“农业”),采野菜、打野物(“采撷业”“狩猎业”),养兔子,在自家屋后发现笼圈遗迹,在邻居家和集市发现鸡和鸡蛋的价值;于是,他们养鸡,从两只鸡、一个小鸡圈起,林间追鸡,配种孵鸡,扩大再生产,翻建养鸡场,直养到二百多只鸡,每天收获几乎200个鸡蛋。然后岛政府干预,不得不痛杀群鸡,结束这“盛大”岁月——顾城自许为“畜牧业”“养殖业”“商业”时期。虽然“一段一段”写成,本书校注者看来,尚属“作者初草,……有提纲性质”(比如其中人名,“谢烨”和“雷”并称);即便说是待定稿,也已相当完整。读来波澜起伏,趣味横生,许多插曲——比如小公鸡“老爷爷”的生死,比如谢烨借车、学车、开车送鸡蛋的过程,让人怅然感动,又忍俊不禁。

2

“辑七 书简及日记”收录45封顾城致家人、朋友的书信(含谢烨、顾乡附信),28段零散日记,还有间插在《养鸡岁月》《(写给儿子)》”等篇的家信片段,贴身记录下顾城夫妻及孩子海外生活、尤其家庭生活一点一滴、一念一动。细读这些片段,对顾城的日常生活,从收支账目,到吃喝拉撒、洗澡睡觉等等,有精确一些的了解——这是目前顾城研究的一大块空白,也是网络世界众说纷纭最无凭无据、却头头是道的一段。借助这些材料,我们不难对其日常起居进行梳理,对顾城生活的一些谜团有一个相对确实的认知。

1988年11月激流岛顾城家中,朋友来访合影

比如顾城和谢烨的关系问题。顾城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依赖性”,有他和谢烨设计、“表演”的“公众秀”性质——这“表演”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功利目的——是生活需要。从婚前到婚后,顾城要拉谢烨进文学圈,以便相伴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他们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帮助谢烨出名;二是表示生活需要谢烨照顾。顾城早期诗作曾署名谢烨去投稿,“让谢烨尽快地在诗的领域中为人所知,于是一旦诗歌活动邀请他时也可以同时邀请谢烨(他们尚在两地尚未结婚时很憧憬可以同时被邀,结婚以后也是)。”(顾乡语,又见《诗刊》编辑王燕生先生文《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1988年9月顾城家信写到:“美国约请是十一月1日到30日,吃住都管(仅限我),还给钱。”这种“仅限我”的活动,顾城会要求会议主办方一同邀请谢烨,理由是他衣食住行离不开谢烨。

原因之二是顾城和谢烨特别的家庭分工模式,“他俩儿在他心目中是一回事,烨学英语、学开车、学打字,他就不学了,他说‘不要学重了,节省下半个人的精力可以干更多的事’。他帮谢烨改诗,改文,有时把自己的放上烨的名字,他回答我说不是作假,烨写的就是这样,她太忙了,他们是分工合作,等烨发表多了就容易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9月26日 星期日”),这是把家庭男女分工改造、放大到极致的生活模式,各擅所长,合作互补,不浪费两个人的心智。因此,顾城出国多年连英文都不会——可别忘了他还在奥克兰大学讲台上做讲师呢!其实呢,不是他学不会,而是觉得没必要学。

就这样,海外行走的这对诗人夫妻,成功完成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塑造,给朋友圈制造了一个艺术化“无能的顾城”:他生活需要照顾,语言需要翻译,写作需要记录(有人竟因此认为,顾城的作品是谢烨代笔!)。为此,顾城不惜自我嘲笑、自我贬抑、自毁形象,夫妻俩还乐在其中。作为顾家的儿子和男人,他生活的能力并不差,其实是一个肯干、能干、敢干的人。他从小跟父母下乡劳动,回城在街道服务所蹬板车、做木活、清烟囱、掏阴沟等等,无活不干;新补的《在亮亮的天空下》说明,他恐怕还漆过屋顶。为结婚花积攒的稿费在上海买了个独院小房,自建厕所、自个修缮。他能自己使缝纫机做帽子,他烙饼很好,还会做汤;种菜、养鸡、修房子不在话下。

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才能明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所记,从10月4日开始,顾城积极主动学英语、学开车,要自己买车,意味着什么:他已经从“依赖”里脱身出来,他要摆脱“无能”的艺术形象、享受“呵护”的幻觉、不处理家务琐事的习惯;他正接受离婚、单独生活的前景;他说,他还有100本书要写,他对自己的未来、对儿子满怀希望。

3

顾城家书和散谈、纪事各篇,有不少关于儿子的记载,认真梳理,可以做一篇长长的“顾城和他的儿子”专文。意外怀孕,胎检心情,出生情景,取名字的故事(此环节谢烨说法和顾城家书的讲法不同),喂养细节,儿子的一颦一笑、一言一动,相互的逗乐、打闹,还包括顾城打孩子的情况,都记录着,做父亲以后的顾城对此津津乐道。同样是写给儿子表达爱意的文字,对照本卷《(写给儿子)》和谢烨的《你叫小木耳》(见“小说卷”),看看二者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情感质地的差异,是有意思的——也留给读者去感受或理解吧。

顾城对孩子的管教,不过是普通中国父母的严管而已,非要找什么不同,在军队大院成长的顾城或许更严格一些,作为诗人的顾城无疑更敏感一些。看看顾城家书里精心或随手所画儿子像,其好玩和开心,历历在目。顾城行为和情感上对儿子的爱与关心,并不缺位。

本辑里,顾城写给儿子的十二篇文字,是谁——连顾城自己——都没想到,这是他最后的创作。1993年10月2日至7日他坚持与谢烨一起写这些文字,回顾他面对儿子的过程,尤其心理历程。比如他知道儿子到来时,“我第一次感到恐惧,我没想到有这样的事,我必须接受的日子”,第一次听到胎音:“……医生把那个声音播得很大,在整个房间里回应,‘哗哗哗,哗哗哗’,一刻也不停止,我看见一个人,踏着海水,向我走来,我不认识他,害怕,看不见他的脸,他一步步走……”有意外到来引起的惊喜和惊惧,有反躬自省的惶惑和惶恐,尤其是文中反复的自剖和自责:“这是我不好”“我待你不好”“我打了你两下,对你不好”“我用难听的话说你”,“我永远对不起你”!不过像胡适说的,“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既来之,当承担之;害怕和惶惑乃至自责,并不是《(写给儿子)》的主题,他不甘、却不得不接受家庭破碎的事实,顾城心底奔涌着对过去的无限悲伤,也有对未来的满心期待:“Sam,我记得,你那么紧紧地抱住我,在黑暗的树林里,你相信我”,“Sam,我只想牵着你再走一走台阶。”纯净明亮的文字,没有灰暗或绝望的阴影,他在对儿子悄声细语,也向就在眼前、聆听他说话的妻子倾诉,希望“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诗句);现实是伤痛的,甚至痛到绝望,幻想和希望从未离开他的心灵。

然而,第二天下午(10月8日)发生在顾城和谢烨之间的一场意外争执——为何争执?是不是也和孩子有关?已是无法解开和印证的死结——和争执激发的一次冲动,毁灭了两个活泼的生命,毁灭了他们在孩子笑容面前张开的怀抱!这是太过惨痛、太过无奈的结局!

4

因缘巧合,2004年我开始参与顾城作品辑校工作,受十来年媒体传播的影响,网络上一片“用斧子砍”“虐杀”“蓄意谋杀”“杀人犯”“精神病”等这样凶狠的评判。当代文学课堂上,讲授顾城诗的老师,常痛感顾城其人、其诗难于统一的错位。接触顾城作品渐多,诗全集两厚册,《顾城文选》四大本,顾城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渐次清晰。从《北京文学》杂志读过、随后搜寻到顾乡女士《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单行本,起意对顾城谢烨事件(以下简称“顾谢事件”)的实情作进一步探问。读到《顾城弃城》这本书,翻检十几年前中国大陆、台港媒体对“顾谢事件”的报道,才猛然意识到:一个尚待勘验的生活案件,如何经由媒体抢新闻、做新闻渲染成惨烈的凶杀案件;一场意外发生的家庭冲突,如何被记者、学者、道德家们袖手旁观“深入挖掘”成反人性惨剧。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在我看来,无非一种由个人完形心理诱导产生的错觉,被法国“群体心理学之父”勒庞所称的“群众心理”左右得面目全非而已。

2011年初《南方人物周刊》一篇新译旧文又一次掀起“诗人何为”的网络“义愤”,让人惊讶;2013年海内外围绕顾城辞世二十周年的议论热潮,让人困惑:二十年来,无论学术圈还是大众媒体,“顾城之死”一直未得到实事求是的对待,人们的演绎、学者的研究中,一些早已公开的基本的事实,仍被无视;人们的谈论,仍停留在媒体当年传播的混乱和困惑里。编校“顾城海外遗集”的同时,我开始追问:顾城为什么会自杀?他的妻子谢烨是怎样死亡的?顾城手里真的有一把斧子吗?在“顾谢事件”周围,各当事人、媒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人们从这个悲剧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反省?等等。

个人的史料爬梳和考证记录,应当另文表达,毋庸在此赘述。从本卷各辑,尤其“(《英儿》未定稿)”“散谈”和“书简日记”三辑,读者可以明晰、清楚地了解顾城、谢烨和小木耳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联系;有此基础,省视人性与人心的宽度和厚度,体悟生命、命运的偶然和无奈,或许会以悲悯之心去理解、去判断“顾谢事件”这一意外悲剧。

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收入顾乡女士《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的初衷。从史料学原则来讲,第一手资料最可贵。顾乡是顾、谢生活最后十四天的当事人之一,这本书1994年2月初动笔,距离“顾谢事件”发生不到四个月,记录的是她当时所见所闻。不少人说,作为顾城的姐姐,她的叙述能可靠吗?此书之外,我搜集了顾乡1993年10月以来发表的各种文字,注意到旁人记录她的谈话和访问;对比书外文字和书里内容,未见到“问题回忆录”普遍发生的记忆错漏,或刻意掩饰的矛盾出入。这是一本读来让人痛彻心扉、不忍卒读的书,作者怎么会编造、怎么去编造呢?二十多年过去,顾乡一直在等待、一直未等来有同时经历的其他人,对这本书提出质疑。

需提一笔的是,从该书网络版分章节阅读的点击数看(见“顾城之城”网站),读者注意力往往集中在“10月8日 星期五”这最后一刻,对此前十三天顾、谢二人的情绪起伏、分合纠结注意不够,他们生活起居细节多被忽视。对试图了解“顾谢事件”发生经过的人来说,这是很可惋惜的。 **(文章有删节)**

20世纪俄罗斯战争文学印象

■王加兴

我与建常君的这部专著《俄罗斯转型时期军事文学研究》颇有些缘分。作为其重点分析对象的阿富汗战争小说《野兽的标记》正是由我和刘宪平先生合译的。不过,在建常君撰稿期间,我们虽已完成译事,但由于种种原因中译本尚未正式面世,所以当时我只能向他提供译文的电子版。后来,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推出《野兽的标记》中译本,让我物色专家为译本写序时,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建常君。这回建常君嘱托我为他的大作写序,我欣然从命,一方面,“来而不往,非礼也”;另一方面,就以战争题材为主的俄罗斯军事文学,我确实也有话想说。

20世纪,俄罗斯在上半叶经历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在下半叶则一度陷入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的泥潭。以小说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对这些战争题材作了多维呈现,尽管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弯路。

在苏联文学史上,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曾被称为20年代文学中的三座“里程碑”,而这三部小说正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塑造了淬火成钢的英雄人物。此类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旋律的作品,在卫国战争文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大批讴歌战斗英雄的小说应运而生,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5)、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1946)、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0),前者刻画了战斗集体的英雄群像,中者讲述了一名飞行员战胜伤残、建树功勋的感人故事,后者则记述了姐弟俩奋勇抗敌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有些西方学者将这种多从国家立场出发激励国民战斗意志,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表达范式称为世界战争文学中的“苏联模式”。

然而纵观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不难发现,即便在苏联时期,俄苏文学绝非仅用同一副笔墨来描写战争。仅以表现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为例,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40)并未将主人公格里高利打造成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这名哥萨克徘徊于红军和白军这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复杂经历与矛盾心态(他两次加入红军,三次卷入白军)。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白卫军》(1925)则将笔触投向红军的敌对阵营——白军,在作家笔下白军部队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并不是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更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而是极为平凡的普通人,而且他们身上不乏闪光点——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为人正直,眷恋故土,坚守信仰;只不过,命运之神无情地将他们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而在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个》(1926)中,一名红军女战士和一名白军军官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男女主人公在孤岛这一特殊环境、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爱情是真实可信的,人性和阶级性复杂地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在最后的情节中,如果说她提枪朝他射击这一举动是阶级意识占了上风,那么紧接着她一边飙泪一边跑过去,把他从海水里抱起来,并失声痛哭的生动场景则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对人道主义(即人性)的张扬在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与拓展。如果说1950年代之前的作品多以展现英雄主义精神为主,那么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则开创了新的局面——作家将笔锋转向饱受战争之苦的普通人:这部被称为“长篇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着力表现战争给一名普通司机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不过,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主人公并未被命运所压垮,而是以坚强的毅力开始了新的生活。拉斯普京在《活着,可要记住》(1974)中所讲述的也是一个普通人的遭遇:主人公是一名逃兵,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而是因思家心切,偷偷潜回家乡,结果酿成了一场惨痛的悲剧。不难看出,主人公所面临的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则以战争中的普通女兵为叙事焦点,描述她们的遭遇和心理活动。五名如花似玉、对生活充满美好向往的女战士在战场上一个个被德国法西斯夺去了鲜活的生命,这不由得令人想起那句名言——“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你看”。爱情也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之一,阿斯塔菲耶夫在《牧童和牧女》(1971)中通过书写一则凄美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战争的强烈谴责。表现女性题材的另一部佳作——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相较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实现了女性视角的切换;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兵人数超过100万,作者走访了其中的500多人,并将数十人的故事进行巧妙的剪辑与编排,从而反映出女性对那场战争的独特感受,这样也就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战争的本质;请看一名女性对战争的记忆和感受:“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在后苏联时期,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4)则是消解战争英雄神话的一次大胆尝试,作者将“反英雄”引入了战争小说中。这里我们大致勾勒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从英雄、非英雄到反英雄的演绎过程。

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对人之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深度挖掘。

以创作纪实文学见长的阿列克西耶维奇,在《锌皮娃娃兵》(1990)中真实记录了阿富汗战争参与者及其亲人的痛苦回忆,控诉了战争的残忍与丑恶;令读者尤为印象深刻的是,当装殓苏联“娃娃兵”的锌皮棺材从阿富汗运回家乡时,“母亲们在墓地里讲述着儿子们的事,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以阿富汗战争为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野兽的标记》(1992)则婉曲地表现了苏兵们的厌战情绪;作者叶尔马科夫使用隐喻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境外作战人员的心理变化,以及战争使人变成野兽的蜕化过程。而以车臣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高加索俘虏》(1994)则通过描写俄罗斯士兵与当地武装分子的矛盾冲突,充分揭示出战争的残酷性;对马卡宁笔下的主人公们来说,杀人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他们都已习惯于将他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蝼蚁。关于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这一主题,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就得到了艺术化的深刻阐释,如安德烈耶夫创作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记体小说《红笑》(1904)看似是一个疯子的呓语,实则刻画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癫狂与恐慌;而所谓“红笑”,是指“一个庞大、鲜红、血淋淋的怪物,在我头顶上,张着没牙的嘴在笑。”“这就是红笑。地球发疯它就会笑。”

以上便是我对20世纪俄罗斯战争文学的粗浅印象。建常君的大作从人性、宗教性和审美表达这几个具体方面,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军事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探索,并未刻板盲从俄罗斯学者的一些时髦说法,而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而言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我国的抗日战争题材十分丰富,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为何我国作家未能像俄苏作家那样写出跻身世界战争文学之林的精品佳作。

(《俄罗斯转型时期军事文学研究》,赵建常著,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